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定價 零售每期四分半年十八

期六角全年三十六期一元二角郵費在內國外酌

加郵費郵票代價十足收

# 人民評論

刊旬

號二十三第

年三十二國華中  
版出日十月二

主編者 人民評論社  
發行者 人民評論社  
社址 北平司法部街甲廿四號  
電話 南局二九四

## 人民評論社第一次徵文獎學啟事

敬啟者本社爲提倡青年作品起見，曾於本刊舉行第一次徵文獎學，業在本刊第二十七號揭曉，並將錄取各稿在本刊今年各號陸續登載。茲復舉行第二次徵文獎學，並開列其辦法於後，敬希全國學界注意：

### 一、題目：

1. 領袖制度在歷史上之評價與中國現時之需要

長城之戰（創作小說）

2. 體例：文言白話不拘，長短亦不限制，惟須繪寫清

楚。

3. 獎金：中選者第1題第一名獎金五十元，第二三名

獎金各二十元。第2題第一名獎金三十元，第二三

名獎金各二十元。

4. 期限：收稿延至三月底截止。

5. 稿件請掛號郵寄北平司法部街七十三號本社編輯室

## 第三十一號要目

時事評論.....蘇 實

「華北形勢日非」

國民黨少壯同志之認識

如何使黨員養黨

法西斯主義批判之批判.....君 平

中國文化運動之史的評述（中）.....趙濟孫

改革省制與更新縣政論（七）.....克 明

美國之買金政策.....凌大挺

我也談談團結·淨化與領袖.....尹梓述

文 藝

悲壯的戰死（詩劇）八續.....楊若萍

本刊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 時事評論

蘇實

「華北形勢日非」——國民黨少壯同志之認識——如何使黨員養黨

『華北形勢日非』 駐俄顏惠慶大使近者回國聽取國情，抵京之日，有詢以歐洲各國對我國態度如何，對偽國態度有無轉變者。顏使慨然答曰：各國對我頗富同情，近因華北形勢日非，各國朝野對我外交上政策，似有懷疑。但願我國今後之情勢，各國對於偽國，無論日方如何宣傳，決不改變其態度。其言哀而諷，我人對之有無限同情之感，而覺政府國民對其意見皆有真心尊重注意之必要。往者顏氏領袖中國代表出席國聯，爭得國聯對關外四省道德上之擁護，否認偽組織之存在，卒使日本不得不退出國聯以爲抵制。此日內瓦智辯之鬥士所以謀衛國保土，爲民族爭獨立人格者，其功績固不下於血戰長城各口之忠勇將士也。顏氏爲外交耆宿，既出席國聯，復先後出使美俄，於國際對中國認識之觀察，可謂最爲透澈明瞭。今言『各國朝野對我外交上政策，似有懷疑』，必非無的放矢。據言各國所以懷疑之故則『因華北形勢日非』，至懷疑

之將來則『仍靜觀我國之情勢』。言外所指，可以想見；我人一語爲之破的曰：黃郛外交，悞矣。戰區十九縣名存實亡，日軍進出自由，而我正式軍隊則不許入境。北平日軍近復公然分往南口湯山演習，險隘盡爲他人探視。一旦有變，日軍自長城各口南進，黃河北岸可不戰而盡有之。黃郛外交所以保存華北者果何在哉！然此猶可譏爲實逼處此。至若賣國賊李擇一殷同輩先後赴日赴滿，進到通車通郵之議，實甘心媚日，欲變衆的承認偽滿，借外交以自重，藉外援以自固。此則『各國朝野對外交上政策似有懷疑』之所自，而華北形勢日非之真也。我人甚冀顏氏此行，回國能挽回外交劫運，此固須政府加以採納，尤賴國民起爲後盾，而嚴密監視對日交外。

(蘇實)

國民黨少壯同志之認識 上月下旬，四中全會行將閉幕之際，華北各省市黨部負責之少壯同志突聯合南下，意與之聚，全國屬目。聞挾策入京。其建議五項（見一月二十七日華北日報）內有：省市黨部以下各級黨部選舉應即停止，2、改進省市黨部之組織實行責任制度，——省市黨部設主任委員兼採評議制度，縣黨部以下各級黨部設特

派員一員以專責成。據中委葉楚槍氏本月五日在中央紀念週報告謂中央對此已有書面指示。內容若何，今尚不悉。我人以為各省市黨部負責之少壯同志此舉所以為本身謀者誠為切當，惟於整個黨的制度問題，似尚欠周密的考察，致未能提出澈底的改造方案。其實施前途恐終不免扞格難通，而有待於修正補充也。

委員制誠屬散漫無能，足滋糾紛；選舉制亦不免玩時、惕日，減低工作效率，且未必真可選賢與能。然若改省市以下各級黨部之委員制為主任委員或特派專員，則省以上之中央必先樹立黨魁制；若停止省市以下黨部之選舉，則必先以選舉權付托於黨魁。設省市以下各級黨部已立集權之責任制，而中央尙為分權之委員制，則事仍徒然。蓋中央為多元的，其影響於省市亦必為多元的；此種情勢下之地方責任制縱能粉飾太平於一時，其中潛伏之委員制病菌與禍根則隨時有爆發之可能。故我人以為國民黨各省市負責之少壯同志誠欲謀黨之改造，必先於黨的制度謀基本之改造，樹立集權的最高領袖完成黨魁制。

今者集權之說已由實驗而更堅定其理論之基礎。白髮老翁、伯納氏生長於典型的議會政治之國家，曾以思想左傾被馬克思之徒稱為共產主義之保標者，近於倫敦費邊社

講演竟亦盛譽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時代趨向之可以想見。

立國世界不宜違背時代潮流，則當把握住時代潮流之主體。集權之稱或曰獨裁，或曰專政，或竟附會之為孟子「定於一」之言，其重要之點，則為以大權付之唯一最高領袖；此最高領袖者，時代潮流之主體也。故不論其國家為戰後失意國如意大利，戰敗被宰割國如德意志，新興民族國如土耳其，社會主義國如蘇俄，末期資本主義國如北美，得有墨索里尼、希特勒、凱末爾、斯達林、羅斯福其人，則無不臻治而強盛；而其所以如此，則在其國民能先其最高領袖，一致勇敢公開地擁戴之。若目光不出於本身利益之立場，不僅示人以不廣，且捨本逐末，事庸有濟！國民黨有胆識之少壯同志應起而勇敢的提出其最高領袖，而公然擁戴之。

(蘇寶)

如何使黨員養黨

何應欽氏前曾以中委名義函中央常委貢獻個人對於黨務政治之意見，其主張中有「逐漸實行黨員養黨」一項，實出於愛黨之熱忱，且為近年以來社會人士所關切之間題，而凡屬國民黨黨員皆應加以注意研究者也。黨員養黨乃政黨之通例。國民黨總章第八十三條明文規定：「本黨經費以黨員所納之黨費與特別費及其他收入充之」，可見黨員養黨之原則固經國民黨採用。第北

伐以後，黨務活動範圍擴充，需用經費浩大，乃不得不取之國庫。蓋為黨工作者為革命奮鬥犧牲，以謀民族國家之福利，勢不得不放棄其原有職業，則由國庫支給生活費，撥付活動費，律以權利義務之義，初非過當。惟日久弊生，革命工作不顯著於社會，黨部不但免漸趨衙門化；昔人為革命奮鬥犧牲換得黨費以苟全生活者，後人竟視黨費為當然之享受。愛黨者乃深慮黨費取之國庫將貽譏社會，惡黨者嫉黨人不勞而獲黨費，遂肆意攻擊，於是羣曰黨員養黨，蓋有由矣。

我人以為黨員養黨之說無可訾議；惟近數年來國民黨未能實行黨員養黨亦自有其特殊理由。國民黨之工作自中央以至省縣就其組織分工言之，大別有三：一曰組織，二曰宣傳，三曰指導民衆運動。以上三項工作，惟組織一項為純粹黨的本身工作，而宣傳與指導民衆運動皆屬為國服務之工作。夫政體既稱以黨治國，時期適在訓政，黨部工作復多為國服務性質，則黨部經費取之國庫，亦未盡可厚非。而黨員養黨之反而更非黨養黨員。按國民黨黨員連預備黨員現多至一百二十三萬四千之數，如謂黨養黨員，無論黨員之接受與否，而所以養之者何來此巨款。今之攻擊黨費取諸國庫者誠不免吻合的懷揣國民黨全體黨員皆沾黨費之惠。其實人之賢不肖殊不若此。世固有為主義信仰所驅使，革命熱情所激動，束身入黨，從事政治生涯，因而菲薄其

可能之較高地位與可有之較優待遇者，未可盡以黨部工作同志為黨費下之寄生蟲，而鄙視之也。

然而黨員養黨終須促其實現，今茲問題為以何方法以達此目的。我人之見，以為第一須寬籌黨費，第二須使黨部工作同志與一般黨員移其在黨內為國服務之工作以從政。至如何寬籌黨費？則黨章已規定黨員繳納黨費與特別捐。此外尚有一法為限制黨員財產至一定程度，過此程度，則其財產為黨所有。如現依此辦法，即就黨中之顯著黨員進行清查，其數當屬可觀，以之養黨，應有餘裕。如此，一方可使黨員與黨之間因經濟關係益臻凝合的聯繫，另方面，因黨中有此種經濟的監督可使黨員之從政者保持廉潔。惟依現今黨務活動範圍以定經費，則此美善之數終虞不濟。而若將黨務活動範圍縮小，又不免失去黨的生命。故我人又主張移黨部工作同志與一般黨員在黨內為國服務之工作，以從政。易言之，即使黨的宣傳與指導民衆運動之工作由黨員運用透過政府之教育，建設，民政等機關以實施之。此實政黨行動之正軌，而先決問題則為喚起黨員的政治意識，提倡黨員的政治活動，培植黨員的政治生活，統制黨員的政治行動。蓋所謂黨員養黨者不僅為經濟的，且須為政治的與社會事業的。黨員有政治熱忱，實現黨的政治主張，造福人民，為利國家，斯亦黨員養黨之一道也。黨中賢豪，請察斯言。

# 法西斯主義批判之批判

君平

一般俗流的或偏私的人們，在論列中，常會表示着對於法西斯主義之不少的疑惑與極度的憎惡，甚至於無恥的造謠中傷。本來，「法西斯主義之制度，頗不免有相當缺憾之存留，是以反對者常引以爲攻訐之口實，謂法西斯主義本身，不克創造任何獨立健全之理論。實則，今日法西斯主義正抒其統治的權威及理論以與其他主義相實驗，藉以揭露其主要之意義而組成其獨自的觀點，且以之應付目前世界一切實用的或智慧的諸問題」。

這兒有五個矜持的見解：

一、法西斯蒂是高度資本主義其物的形態，出現於高度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切反動傾向者，是曰法西斯蒂。二，法西斯蒂惟出現於後進資本主義的國家現象，在高度資本

主義的國家，不會發生法西斯蒂，即使有此種傾向，也不會充分發達。三，少佔殖民地國家，爲了國內的生產過剩，無法擴充所必需的市場，以致無以保障日益窮困的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分子，其結果便發生法西斯蒂運動。四，蒲哈陵則認爲法西斯蒂的發生，雖以高度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社會危機爲根本原因，但不以其中的一切反動傾向爲

經濟恐慌之普遍與深入或疾或徐地出現。試就美利堅言，在整個世界經濟不景氣中，美國雖擁有龐大的資本，然因爲受了恐慌的傳播所謂永久繁榮一語終成空談。自羅斯福就職後，在國會中便有葛拉斯銀行議案（Glass Steagall Act）及恢復工業議案（Industry Recovery Act），因爲一則可使全美銀行置於政府監視之下，一則可使全國工業在一總計劃中獲得統一的節制，由此美國經濟的個人主義及自由競爭將要完全失去效用，犧牲了國際合作而採用極端的國家主義。所以大總統的親信顧問副國務卿穆萊說道：「行政在進行工作的是一个在建築術上更爲和諧的國家生活，是希望更爲親密的，由監督經濟事件的起伏不定，俾對全國公民確保普遍的利益，不爲特殊的利益而犧牲」，這不是證明恐慌期中高度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之形成嗎？在政黨的組織之出現 美之KK黨（Ku-ku-k-kean）英之莫史萊（Mosley）組織的新政黨（The new party），法之法門（Le Faiscandes condallantset des-praducteurs），愛國青年團（Féuilles Palnotes），愛國聯盟（Leaguespatriotes）等還不是很顯著的事情嗎？至如所謂殖民地之廣狹問題以爲在法西斯主義之發展上有其決定的意義，則今日例舉荷蘭正是一個強有力的回答。在現階

級荷蘭的政治分野上沒有法西斯運動之形成，如其說殖民的廣狹問題云云，無寧謂在資本主義內在法則支配的發展上生產與消費之患不均。因爲初期的殖民地尚可以爲商品的尾閭及原料的產地，然在一定的場合之際，形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一般貧困化，即在最野蠻的畛域也無法消納資本生產之過剩，這是必然的歷史諸條件之所由決定的事情。他如蒲哈陵謂「高度資本主義之比較廣汎的大衆層級」，尚覺近似。但從事際方面說來，高度資本主義國家，易使社會危機趨於穩定，資本主義較脆弱的國家，缺乏伸縮餘地，一經恐慌襲擊，不免銀行倒閉，金融動搖，信托制度的凋殘，對外貿易的滯滯，生產事業的枯萎，失業人數的激增，在此情況下，法西斯蒂自是易於發展。所以高度資本主義之言，還不是正確的結論。還有所謂「共產主義、戰略上的失敗」，這正是表現了布爾塞維克人對於歷史事實之抹殺及單純階級的偏私。因爲法西斯蒂是大多數人共同意識之集體的表現，是一國內中間層級如智識分子，軍人，公務員，小商人，勞動農民及自由職業者之堅實的組織物，不是布爾塞維克階級的主見與布爾喬亞個人的自私。一九二一年意大利法西斯第一回大會所採用施政綱領（Program）內對資本主義有種種重新確認的明白規定，

即資本之極端的一時的累進課稅（顯然含有沒收資本的性質）修正戰時所得稅法及徵收至百分之八五的戰時所得稅，沒收借債的財產等。（見戰鬥的法西斯帝綱領第九條）「一齊解散以產業及金融為目的的股份公司，禁止所有銀行及交易所機能行為。」第十條「登記及課稅私有財產，沒收不生產的收入」。由此可見一斑了。一九三〇年工業資本反法西斯領袖波西斯（Aboflio Be Bosis）之被檢舉。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意大利首富人造絹絲公司董事爪里諾（Riario Gualino）因「引起國民經濟大糾紛」的罪狀被放流於力特里（Tigari）島，為期凡五年。一九三〇年，大電氣事業家阿特黑爾的克電氣公司董事長班扎拉薩（Commanbatore Pannarasa）以違反法西斯帝經濟政策而被捕。可見共產黨人謂係大資本家超合法的攻擊手段之術言的不當，且如德國法西斯政綱中有「個人的活動不得妨礙全體的利益，應以全體利益為前提」。「本黨要求廢止不勞而獲之利益，並打倒利息制度」。「凡利息皆須生命財產上國民之重犧牲，而後可以構成者，故利息而致富之國人，實為國民之犯罪」。即從法西斯領袖的口裏

## 中國文化運動之史的評述

（中）

趙濟孫

——也可以聽到法西斯主義的實質的闡揚。慕索里尼云：「法西斯國家，乃是統一的，而且是原來自己創造的，牠不是反動的乃是革命的。牠預先知道解決一般政治的問題，這與其他反對黨，權力超超的議會，或不負責的政治會議等所應付的各種政治問題是同樣的。同時牠又用企業組合主義的制度去解決經濟領域的問題，這對於勞動界的重要與在工業界是同樣的。至於道德方面，則以秩序，訓練，服從等為國家道德的表率。法西斯主義是希望國家為一個健全而有組織的團體，牠在經濟方面的活動，影響了國民生活的諸形態，並構成了經濟的、政治的以及精神的力量的各種組織」。「為祖國的較高利益計，企圖發揮個人的活動與紀律，此二者均係代表道德性的實際，而能以繼續進步為條約，故政府或民族如有停滯不進，即是覆亡的朕兆。」希特勒說：「我們並不怕打破德國的鎗鍊，如果我們打破鎗鍊之後，可以保證德國工人享受生活的必需」。

這樣，可以證明上述的批判者都是出發於個人的成見或階級的偏私，因此我們有理由來寫這一章批判之批判。

以分為「社會經濟的變動」，「文化運動的經過」，「文化運動失敗的原因」，「文化運動的影響」，和「科玄論戰與古史論戰」五方面來考察：

(一) 社會經濟的變動 單獨排滿的辛亥革命，失了中國國民革命的真面目，國民革命的對象——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因而虛談愈熾！同時，中國社會裏的革命潮流，亦因袁世凱的反動而低落下去。二次革命失敗，幾乎一般社會都認革命是作亂，民黨是亂黨。而國民黨本身呢？則右派宋教仁黃興等在二次革命前力主妥協緩進，使袁世凱得以借帝國主義之贊助鞏固反動勢力；在二次革命後，就已有許多國民黨投降軍閥，受其收買；但這些右派與宋案

發生之後還迷戀于所謂法律手續，和平解決。同時各地紳商階級為保存自己的優越地位起見，竭力去結託革命黨。造成新的軍閥，並且鞏固軍閥的政權。這樣，所謂革命黨便不啻與廣大民衆脫離關係，袁世凱等軍閥和士紳階級自然容易拿着和平秩序的假面具欺騙一般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結果，反動勢力便完全戰勝了革命黨！

但是，民元時代的國民黨，是為了做政治活動而成立的；及其不能安然從事議會活動的時候當然亦就會消滅了

。自成立之初，總理即未曾理會，但宋氏在滬被刺後，總理就洞知袁氏要帝制自爲，誓撲滅之。遂將國民黨解散，于民三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備袁氏稱帝時，再領導同志，起而鬥爭。因之，嗣後就有「討袁」，「護法」和「護憲」諸役之發生。

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難受國際帝國主義者的種種障礙，終能向前進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在生產工具的私有形式之下，向工業化的方向進行着。資本主義之在中國，或者更正確些說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在五四運動的前後，有了偉大的成績，尤其是在歐戰期間，國際帝國主義者加于中國的壓迫，因大戰的關係，大大的衰弱了。

一切帝國主義者——除掉日本——都集中其注意力于大戰，舞暇闊及中國了，遂使中國獲得工商業壟斷及營業獨占的機會；于是中國工業頗有長足的進步，呈現空前的盛況，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二年，即所謂中國工業的黃金時代。

在此期間，單是揚子江流域所發達的企業，計有發電所二十六，運輸業十八，農業十八，紡織工廠十六，商務公司十五，鐵山工業十二，漁業公司三，及其他八種，總共資本一億五千萬元。再從海關的輸出入表現觀察，也可看出這時期中國工業地位的重要了。即在大戰開始以前的

一九一三，對外貿易計有一億六千六百餘萬元之鉅額入超；在大戰停止以後，入超之數尤鉅，而獨于大戰期間，則每年入超之數均大見減少，如一九一九年，僅祇一千六百餘萬兩。由此可以證明在大戰期間，中國工業因免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得到壟斷的機會，而且非常發達。在這期間，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成長起來，亦要要求自己的前途，所謂提倡國貨了！

正當帝國主義者混戰凶猛的時候，協約國的主力軍俄羅斯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發生大革命，無產階級得到了勝利！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另建立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首先與德意志權和，簽訂「布勒斯特里多佛斯科條約」；並主張西歐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革命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這種革命運動對於我國的影響非常之大！

因辛亥革命的結果，只推倒了一個滿清政府，建設了一個名義的中華民國，政治仍不能走上軌道，依然是危機四伏，因而文化方面亦被「復古思想」所籠罩。原來當時有所謂孔教會者，在各地都有支會分會，並且發行一種孔教雜誌，以定孔教為國教做宗旨。後來國教的名目雖未成

孔教為修身大本的議案，還是「媽祖不絕」呢？孔教會除出雜誌外，還想建造一所大規模的孔教堂，擬有募捐辦法，一時也頗「雷厲風行」；可惜時運不佳，「時代先生」到底不肯退讓，于是他們的計劃終于默默無聞了！又當民國三四年的時候，袁世凱既以武力「掃平天下」，為「收拾人心」計，也常提倡什麼忠孝節義，什麼八德十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到後來便有帝制的結果。當時出版界不願受這種復古思想的束縛，首先就有章行嚴主編的甲寅雜誌出世，評論時事，說理極其精確，深得讀者的歡迎。後來不幸，因國體問題竟被查禁，讀書界中如失慈母！民四九月十五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又出現，喚醒了迷夢，照亮了黑夜，於是青年的勇氣恢復了，精神充滿了！請看它所貢獻我們的：『人之生也應能戰勝惡劣社會而不可為惡劣社會所征服；應超出惡社會，進冒險勇鬥之兵，而不可逃避惡社會作退避安閒之想。』（見第一期陳氏的「敬告青年」）與「陳腐朽敗分子作頑很的戰鬥」啊！這便是他呱呱墮地的第一聲！

當時的新青年見了「青年社會加此銷沉」（語見該誌二卷一號通訊），所以「以致造青年之思想，指導青年之而上諭式的尊孔命令，讀經命令，固已「堂而皇之」地頒布了！它的「尾音」，竟延到民國七年經安福國會通過修養為天職。」如「抵抗力」，「血與鐵」，「電飛將軍

傳」，「興登堡將軍傳」等，皆是鼓勵青年奮鬥的文字。此外又提倡文藝，如小說春潮，歐洲花園；劇本「意中人」，弗羅連斯；論文「現代歐洲文藝史譚」，及詩歌，筆記等，提倡科學，介紹法國文明，都可說是該誌的特色。而最有關係，最為引起新思潮有力的根源的，實要算自由思想和打破迷信的文字。如「孔子平議」，「吾人最後之覺悟」，「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非君師主義」，便都是所謂「違俗之論足以駭人聽聞」的。但是新青年雜誌的言論最有影響的是甚麼呢？這就是「五四文化運動」。

(二) 文化運動的經過 凡文化運動都是新舊社會意識的鬥爭。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運動，就是資本主義的意識與封建意識鬥爭的運動。因為中國變法維新革命，三十年運動的結果，雖然把滿清政府換成中華民國；但是招牌雖然新了，而內部的人員仍是舊的，革命雖然成功，而人的意識仍未改變。于是一般有西洋思想的學者——如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作人，魯迅，劉復等——覺着欲改革一切，非先改革思想不可，乃一方面盡量的輸入西洋近代的資本主義思想——德謨克拉西及賽因斯——，一方面對於二千年來隨社會而傳統下來的封建思想竭力攻擊。請看

陳獨秀的話：「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最有關係，最為引起新思潮有力的根源的，實要算自由思想和打破迷信的文字。如「孔子平議」，「吾人最後之覺悟」，「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非君師主義」，便都是所謂「違俗之論足以駭人聽聞」的。但是新青年雜誌的言論最有影響的是甚麼呢？這就是「五四文化運動」。

胡適則主張他的「八不主義」——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倣古人；三曰，須講求之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文學改良芻議」。

胡適他又有「四條主義」，比「八不主義」更為積極，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

話怎樣說，就怎樣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他又擡出「十個大字的宗旨：『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是他建設新文學的唯一宗旨，也就是他的根本主張。這種主張，在現在看起來，似乎是平淡無奇了，在當時確乎是一個震天價響的大砲！所以，七年二月，就有王敬軒的一封信（見新青年四卷三號），把提倡新文學的人狠狠的教訓了一頓；然他老先生的話，一經批駁，便半錢不值，片甲無存了！在第三四五各卷的新青年裏，關於新文學的討論很盛，且登載許多白話詩，採用新式標點。而第一部白話詩集胡適的嘗試集也于七年出版了。從此語體的詩文，通行全國，到八年全國教育聯合會開會且通過小學校教科書改用國語的議案了。

民國七八年間，新青年派這樣「猖獗」，便引起第二次的復古運動來了。當時便有所謂「新舊之爭」，把綱常名教當做舊的，把德謨克拉西及賽因斯當做新的。其實在共和國裏，還有什麼叫做綱常名教的東西？現在居然起了衝突，真是不可思議！更有一般人想用折衷主義來調和新舊，更奇怪了！這第二期的復古運動，可舉三個例子來作証，第一是國故派林紓等反對北京大學教授胡適等提倡新

文學，除做了荊生，妖夢等小說外，幾次三番和蔡元培寫信辯論，且有『拚我殘年，極力衛道』的話。然而蔡氏不為所動。第二便是文治總統徐世昌的命令；要提倡道德了，要提倡節孝了，要尊孔子了；同時還有『妖言惑眾』的什麼同善社，悟善社，盛德壇，在『青天白日』之下，『橫行無忌』。而他們的敢于這樣，都因背後有大力者支持的緣故。這種頑舊的思想原與腐敗的政治為緣，並不足怪。第三是舊黨籍政治權力遏止新思潮。請看江蘇省長齊耀琳訓令上海寶山內縣知事的文章：『……近閩坊間出版之著作物，間有主張破除吾國舊有倫敦，毀滅吾國固有文學詩集胡適的嘗試集也于七年出版了。從此語體的詩文，通行全國，到八年全國教育聯合會開會且通過小學校教科書改用國語的議案了。

民國七八年間，新青年派這樣「猖獗」，便引起第二次的復古運動來了。當時便有所謂「新舊之爭」，把綱常名教當做舊的，把德謨克拉西及賽因斯當做新的。其實在各校校長對於主張悖謬之出版物，嚴禁購閱，以黜邪說，……大家看：既承認思想自由，既承認有研究餘地，而又斥為主張悖謬，嚴禁購閱，這是什麼道理？可憐執迷不悟的頑固分子啊！原來你們是讀了書不明理的！

二千年來本是有哲學的國家，而中國的哲學亦自有其特殊的系統與內容。但是到了最近，中國的舊哲學隨舊社會而崩潰；新的哲學又因為社會的經濟條件不充足而無法建設。所以在最近的數十年中，真有點哲學貧困的現象。但是，一種文化運動，必定有它的根本態度與根本思想，而所謂根本態度與根本思想就是哲學。所以在歷史上凡是一種文化運動，都可說是一種哲學運動。凡文化運動的主角都是哲學家。沒有福祿特爾（Voltaire），盧梭（T. T. Rousseau），孟德斯鳩（Baroude Montesquieu），第德諾（D. Diderot），當然沒有所謂「啟蒙運動」；沒有辯証法的唯物論的馬克斯及恩格思，亦不能有今日的社會主義運動。因為在一個文化運動中，所有的運動雖然是各方面的；其參加的人員雖然是多方面，但是哲學的理論是各種理論的基本，因而哲學家亦就成為各種人員的總指揮了。我們根據這種定律來檢閱五四運動時代的哲學與哲學家。

當時自命為文化運動領袖的人物除了陳獨秀就是胡適，胡適的根本思想是「實用主義」（pragmatism）。所謂實用主義是甚麼？塔爾海瑪（A. Thalheimer）說：『實用主義就是商業哲學』。（現代世界觀第十六章）這種主義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所以這種哲學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到處盛行，起初發生于美國，後來普及于英意。中國辛亥革命以後，在表面上是資產階級抬頭，于是到了五四運動時，所謂改造思想的文化運動家便把這種思想再移植到中國了；並且把當代實用主義的巨子杜威請到中國現身說法。於是實用主義的風頭雖然是出得十足，另有一派人看的眼紅了，遂本着他們的階級立場出來明爭暗鬥的加以反對。

當時與實用主義對立的思想可分為二派：一派是梁漱冥的「孔家哲學」——孔子的思想本來是封建社會的典型思想，它的發生由於封建社會，它的完成亦是由於封建社會。它在二千年來繼續發展，仍是由於中國的封建社會編延了二千餘年的原故。自從八十年前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使中國社會的結構起了急劇的變化，孔子的思想隨着封建社會起了動搖；其他一派是代表地主階級的張東蓀張君馳等的柏格森杜里舒的「生命派哲學」——是西洋資本主義沒落時代的思想，蔑視了外界的環境，注意內心的生活。這樣一來，一方面可以使日暮途窮的資產者暫且苟安一時，而把躍躍欲動的無產者的革命思想也就此麻醉了。這兩派的哲學雖然是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在反對實用主義的一點上是相同的。所以，梁漱冥批評當時的文化運動說：「看不出有甚麼態度的表現，沒有深刻的思想，祇有一點淺薄

的感想。』

山上面之分析，我們對於五四文化運動意義可以得到幾個要點：第一是資本主義文化與封建文化鬥爭的運動——吳虞獨打「孔家店」，企圖根本摧毀「吃人的禮教」；第二——胡適陳獨秀等的白話文運動——即所謂文學革命——此種意義極為重大，蓋一方面過去的死形式不能裝載現代的活內容——試看嚴復所譯的社會科學，林琴南所譯的西洋諸文學作品就明白了——這種形式的解放是積極的意義，一方面所有過去一切落後的意義，都保存在古文裏，這種形式的摧毀，又是消極的預防；第三是方法論，主要的是形式邏輯的介紹；第四是文學的寫實主義與創造社的浪漫文學——自我表現——出現于中國的文藝界，佔了領導的交椅；第五是金融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與技術學高度發展的美國式的實用哲學之輸入；第六是歐洲資本主義沒落期一般的意識的輸入，如維太命主義，新浪漫主義等；第七是「疑古之同」等的疑古，錢玄同會說：『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新青年二卷六號）後面另有專節敘述，此處從略；第九是非宗教運動及蔡元培等主張以美育化宗教——這個運動發生的原因，是由于北京要開一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我國有一部分大學教授及青年學子，認為這是宣傳迷信，于提

倡科學保護自由大有妨礙。所以在上海方面有「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有「非宗教同盟」之組織，其他各地也都組織團體，作非宗教的宣傳運動，特別的是反對耶教，警告青年不要被誘。現在這個運動的實際雖然不大顯明，然我們要知道：這是社會上一個大問題，在歷史上也必成爲一個重要的事實。因爲這明明是宗教和科學的戰爭；第十是科學與玄學的論戰，更是文化鬥爭逐漸深入的證據，而且是科學進一步的抬頭，詳情後面再述；第十一是郭任遠行爲主義心理學——人類的行為——的介紹，不但使心理學失去了牠的靈魂，而且最後使心理學失去了它的意志。

（三）文化運動失敗的原因——所謂五四運動，無疑的就是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所以胡適說：『新文化底最大貢獻在於指出歐洲底新文明，不但是物質文明比我們高明得多，連思想學術，文學美術，風俗道德，都比我們高明得多。陳獨秀先生曾指出新文化運動只是擁護兩位先生，一位是賽先生（科學），一位是德先生（民治）。吳稚暉先生後來加上一位穆姑娘（道德）。』（新月二卷六七號「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這裏胡先生所謂「歐洲底新文化」當然就是歐洲的資本主義文化，所謂賽先生是資本主義的科學，德先生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穆姑娘亦不過是

資本主義的道德。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根本是建立在無政府主義的自由競爭上，因之個人主義的思想就成為資本主義文化的根本思想了，所以胡適又說：「新文化運動底一件大事業是思想的解放」，這裏所謂解放當然是指思想自由而言，而思想自由的極端則是個人主義。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資本主義文化是否能適宜于中國今日的環境？從五四運動的結果看起來，它對於二千餘年的封建思想加以批判，「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

，否認上帝。」這的確是在破壞封建社會的歷史使命上應有的工作；但是就其在開闢將來的路途上，則可說毫沒有一點作用。因為時代到了二十世紀，究與十八世紀不同，

中國的封建社會雖然被西歐的資本主義震撼欲動，但是中國的整個社會已經完全處于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所以中國要像美國當年，根本把封建勢力摧毀，正式走上典型的

資本主義路子固然無法，就是像德國的資本主義在封建勢力之下潛生默長起來亦是不能。一言以蔽之，即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祇有由半殖民地而成爲完全殖民地，絕沒有發展產業的希望。前而曾經說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歐戰期間，因各帝國主義者暫時停止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經濟侵略之機會，得到了飛躍的發展；但是一到歐戰終

結，情勢忽然變了；歐洲各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經濟侵略的鐵蹄，馬上又捲土重來，而且較前更加劇烈，如新銀行團的成立，對華巨額投資的計畫；大批商隊的向中國開發；在華工業的再度經營和擴充，便是顯明的例証，同時，日本帝國主義乘歐戰時期侵了大財，對華貿易已佔得絕對優先地位，歐戰停止後，復申其魔手，和列強競爭中國市場，于是幼稚的中國民族工業，不得不任人摧殘，束手待斃了！

產業既不能發達，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當然無從建立，而所謂資本主義的文化又如何能與社會相適應呢？所以德先生的政治之下，不過是增加了許多政客官僚；賽先生的教育之下，不過是培養出許多洋八股舉人；而穆姑娘的號名之下，亦不過是庇護了許多貪鄙無恥殘民賣國的醜男子。因爲德先生是一種虛偽的民治，是一種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工具；賽先生不獨是皮毛，而且只是應用上的科學，實證上的科學，並未深入到其理論上的應有盡有。穆姑娘只是一種假面具，結果造出來許許多多的男盜女娼的劣迹！所謂「世界的文明」，「歐洲的文明」即資本主義的文化所貢獻于中國者如此而已，難道真是「橘逾淮而爲枳」嗎？東西文化真有根本不同之處嗎？西方文化與中國

生活果真是不能互相融洽嗎？不然，文化的本質上並沒甚麼東西區域不同，而祇有時代前後的分別。祇因當時的文化運動家，沒有認識歷史，看清世界，以及文化本身所依存的條件，所以便拾人唾餘似的把西洋行將沒落的資本主義文化，硬要移植到行將沒落的中國封建社會之上，當然就是要破綻百出，毫無融洽之處了。

(四) 文化運動的影響 因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在世界史上實在是劃分中國之政治經濟思想等為前後兩時期的運動，故其影響甚大。並且這些影響，其價值比罷免國賊和拒絕簽訂德約兩件事，要重大得多。

第一是陳胡二氏的分道揚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正當世界資本主義沒落，社會主義運動勃興的時候。於是民族資產階級剛剛成長，而無產階級却以更快的速度成長起來；五四運動以後，工人運動不但是與資本主義的運動並駕齊驅而進，實際上還更顯出它底力量超越資產階級。新青年自七卷起（八年十二月），便發表宣言。從宣言裏我們曉得他們是反抗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了。他們主張群衆運動社會改造，他們尊重勞動。總之，他們是要打破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了。這樣「大膽的宣傳」，「決斷的態度」，的確是當時出版界裏最勇敢人生觀舊方法的不對，力求新知；就是那老成持重的人

敢的！而五一節特出勞動紀念號，愈可看出他們的傾向。從八卷起（九年九月）就很顯然的主張革命的社會主義了。

試看它的內容，如俄羅斯研究，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唯物史觀，馬克斯還原等題目，便可知道。於是聰明的陳獨秀開始來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學生說：「工人的力量比我們大些。」他同着他所影響的急進的知識分子，開始與胡

適派分化，改變自己的方向，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方面，改向到社會主義的蘇聯方面；由凡爾塞會議和華盛頓會議，改向遠東民族會議（一九二二年在第三國際旗幟之下召集的一了。而胡適一派呢？却仍然做資產階級的忠實代表，抱着美國杜威博士的實用主義，法國啟蒙時代的機械唯物論？向人家說：『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當時的中國，也還是一樣的扯得開。新青年分化以後，陳派的響導週報成為共產主義的言論機關；胡派的努力週報成爲鼓吹好人政府的言論機關。

第二是促進思想的改革——中國思想界從新青年出世提倡新文化以後，雖然逐漸解放改造，但受其影響的人，究竟還是少數；一般人還是莫明其妙，漠不相關。自五四運動以後，社會上受了極大的刺激，青年界固然大家覺悟，舊人生觀舊方法的不對，力求新知；就是那老成持重的人

也無形中受其影響，思想方面也有多少的革新。並且青年學生從五四運動以後，又有一個重大的覺悟。就是從前以為「無論什麼事，知易行難」；現在却感到「無論什麼事，知難行易，不知故不行。」一般民衆對於國家政治不來參與，這就因為他們不知共和公民有參與政治必要的原故。所以要改造我們的國家，要改製我們的社會，非竭力從事文化運動，使我國全體人民都受共和精神，科學精神，社會思想，經濟思想的洗禮，大家起來協力合作不可。因此，宣傳新文化的新出版物便應運而興了。在五四以前，新出版物本只有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和其他兩三個日報；五四以後，各種季刊，月刊，旬刊，週刊，三日刊，日刊等新出版物，驟然增加到四百多種。這四百多種的新出版物，一方面研究問題，一方面介紹學理，程度雖有深淺，壽命雖有長短；但無論如何，總多少有喚醒社會，促進思想改革的效力。民九出版界的趨向一變，從雜誌移到叢書了。這個變向的原因，可以說是國人智識慾發達，讀書力進步的結果。

第三是引起教育界的革命——五四以前，因襲的專制的被動的教育，雖有革新的趨勢，漸漸向自由自動的教育走；但多數學校，仍是死守部章，施行機械教育，專事不

滿學生的需要。從五四運動以後，一般學生經過實地的試驗，「自己是能動的，不是被動的」的自覺，更深刻一層。並且在這次實地試驗的過程中，不但發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種種缺點；學校的種種缺點；自己的種種缺點，也都發見了。於是覺悟到「實行改造，要從卑近的小範圍做起」。要改進全國，先要改造小地方；要改造社會，先要改造小社會；要改善民衆的生活，先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學校是學生最切身的社會，是學生一生事業的發源地；學校生活是學生當前的生活，是學生修養知德才能的生活；學生教育不好，將來一切便都沒有希望！他們對於這種死守部章。施行機械教育的學校，那自然不得不急切的要求改革了。所以從五四運動以後，一般學生把他們對政府的目光，移轉過來對學校；各地學潮便接二連三的起來了。

第四是青年的團體活動及社會服務——學校內的團體生活，在五四運動以前本很少；在五四運動以後，非常增多。其中尤可注意的，便是各地學校「學生自治會」的紛紛成立。這是實施民衆訓練的最好機關。學生的自動自律的習慣，互助合作的精神，和批判力，發表力，制裁力，服從心，責任心，辦事才，都可由此養成。這實在是五四

運動後學生界自食其果的最好事。再則，五四以前，學生只在校門以內，芸窗之下，過他們埋頭讀書的生活，和社會接觸的機會很少；替社會服務的事更是沒有。五四運動一起，學生忽然跑出校門，和社會交涉了。社會上的種種缺點，都看在他們眼裏；他們才覺悟到政治問題的後面，還有更重要的社會問題；從此他們便努力實行社會服務，如創辦平民學校，通俗講演，社會調查等事業，都日益發達起來了。

(五)「科玄論戰」和「古史論戰」的評述——五四運動最大的收穫，除了上面所述的以外，尚有「科玄之戰」及「古史辨」兩種事業，值得注意。先就「科玄之戰」來說，文學是一種思辨之學，與科學之為實証之學者相反。因為科學這實証的東西，處處是要証據的，當然仍不能容許它存在。但何其為思辨之故，科學要攻打它，就必表現為哲學的論爭形式。這就是說，科學與文學的衝突是表現成物質論與觀念論爭鬥的形式的。我們在這裏要明白：哲學地說來，思辨之學就是觀念論，實証之學就是物質論。思辨始終是不脫離心靈的，在方法上是以思維的推演為主，感覺·方法則以觀察為主，思維是不能離開事物而憑空玄

想的。它的理論因而須根據事實，不能有外。所以科學的本身就是物質論的自然觀。這種鬥爭，科學與文學的論戰，已經過了好些階段：第一次出現在英國，是以培根，笛布士及洛克為中心；第二次在法國，是即十八世紀底物質論者恭第納克，第德諾等人反對十七世紀的文學笛卡兒等的運動；第三次是在德國，這就是黑格爾左派的運動。這中間出了一些偉大的物質論者，如費爾巴哈等，他們反對文學非常激烈。

現在我們來考察中國的「科玄之戰」。時間在民國十二年前後。這次論爭的參加者，站在文學方面的為張君馯，林宰平，張東蓀，范壽康等；站科學方面的則為丁在君，唐鉞，朱經農，章演存，胡適，任鴻雋等。據張君馯的意見，科學最大的目的，在「擯除人意之作，把一切現象化之為客觀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窮其因果之相生。」所以自然法則的特徵有二，「一曰兩現象之因果關係，有甲象起，則乙象隨之而至……；二曰已成公例者，可以推及於一切新事實。」進一步說，「科學不僅在求一定之因果關係」，而且要「將這些關係化為分量的」。此「物理學之所以為嚴正科學學」。（人生觀之論戰（上），一九二一，一〇〇等頁）然而科學「但論因果，但論官覺之

所及。」一到人生，就不同了。「人生爲活的，不如死物，質之易以一例相繩」。因爲「人生之總動力爲生之衝動，就心理言之，則爲頃刻萬變之自覺悟」，不能據因果公例，由甲態以推乙態」。「而人事之所以日進不已，皆起於意志」，起於「良心之自動」。「心爲實在」，沒有因果，則意志便是自由了。所以「人類活動之根源之自由意志問題，非在形而上學——玄學——中，不能瞭解」。「玄學之名，本作爲超物理界超官覺界解釋……。惟其有此解釋，於是凡屬官覺以上者，概以歸之玄學」。玄學原是不可少的。因爲科學不問事物的本質和根源，而「人類之天性」，又「不能不同」。這就只有訴諸玄學。並且「分科之學之是非，由衡諸超於諸學上之最高原理，而融會貫通之」。這也就在做玄學的事情了。玄學者「諸學之最終裁判官也」。（引語順次參看前書一〇一，三，序一一，序一二，九一，七，序一六，六二，一〇二，序一四一五，等頁）

再看所謂科學方面，丁在君根據皮耳生等的理論，說科學「以感官感觸爲我們知道物體唯一的方法」。而「我們所覺得的物質，本不過是心理上底覺官感觸，由知覺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論。科學研究的，不外於這種概念同推論」。「科學既然以心理上底現象爲內容」，則物質

就是「思構」；同時，「凡是心理的內容，真的概念推論，無一不是科學的材料」。如此，還「有甚麼精神科學，物質科學的分別」？所以科學是主觀論的，觀念論的研究。其客觀性，在於常人心理的內容之相同，大家有一樣的感覺。不知此者，反「誤以爲……科學是機械的，物質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君勵對於科學最大的錯誤，以爲嚴正的科學是牢固不拔」，……「科學的」就是「有定論」的。其實「馬哈，皮耳生，都不承認科學底公例有必然性」，「只有玄學才如此，這是科學同玄學根本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說「科學的方法，不外將世界的事實分類來，求它們的秩序。等到分類秩序弄明白了，再想一句最簡單明白的話，來概括這許多事實，叫做科學公例」。「凡是事實都可以用科學方法研究，都可以變做科學」。「胡適之講紅樓夢也是科學」，因爲他是用了科學方法的。「所以科學的萬能，科學的普遍，科學的貫通，不在它們的材料，在它的方法」。（引語依次見人生觀之論戰（中）一一，八，九，一三，二四，三八，三九，一八等頁）「至于玄學呢？那是講本體論的，不必管它」。（前書一六頁）

所以有人說：「這樣看來，丁文江（在君）之所謂科

學，完全是文學的見解，錯誤到無以復加了。比之張君勵底認識，淺薄得很！張君勵所把握底科學是說明科學；而丁文江則只是在敘述科學底門外踱來踱去。這且不必說，尤可笑的，是他斷送科學，投降文學。」又說：「文學勝利了。張君勵，林宰平，張東蓀，都是相當的科得科學與文學底人。丁文江真是對此兩者一無所知底「科學家」。

但是，文學在這時已經漸漸失了社會的基礎，所以終久是敗下陣來了；雖然當時丁文江胡適輩所用的科學，是那樣淺薄幼稚；但是一到了一九三一年，為「科學而戰」的二十世紀雜誌出現以後，方給這個論戰下了一個嚴格的批判，澈底的清算，使它才得到了最後的結論。

其次，再就古史論戰來說。前面曾經說過，吳虞的鬥爭，是對於孔子和其禮教的非難，這是一個資本主義意識對於封建意識的正面鬥爭。胡適本着他在美國所受的資本主義的薰陶，從社會的病害來解釋古代哲學或名學，同時用社會病害來解釋五四時代的社會問題——封建社會崩潰中所興起的問題，這純粹是杜威的實用主義的觀點。胡適便用着這樣的觀點——資本家的現點，來解釋中國社會史，是時勢之變化所使然了。梁啟超解釋中國社會史時，多用

着地理的觀點。胡適民也會應用過經濟的現點。他們都憑藉新知以商量舊學」，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要求解釋中國的古代社會的思想以至政治了。而從這兩思想和政治的追求，必然要進求到古代的歷史。古史的研究，便必然的從這種「理論形式」的邏輯發生了。

自民國十二年五月，顧韻剛先生在努力增刊讀書雜誌第九期發表了他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和按語。他在此信

中根據幾部並非歷史的古書，如尚書、論語、詩經之類，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見古史辨第一冊六一頁）的有名的主張，並在按語中總括地說道：「如這封信裏所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見同書同冊六〇頁）錢玄同先生的回信，更進一步，信中說：「先生所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意見，真是精當絕倫。舉堯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詩說為証，我看了之後，惟有歡喜贊歎，希望先生用這方法，常常考察，多多發明，厥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後來學子不致再被一切僞史所蒙。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後，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堯舜的意義，就和「聖人」

，「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的歷史應該從禹說起。……今讀先生之論，証以長發和闢宮兩詩，方知連禹這個人也是很可疑的了。」（見同書同冊六七頁）

這樣一來，在中國史學界惹起了關於上古史的論爭的一個大波瀾。反對顧先生的見解的有劉掞黎，胡堇人，柳翼謀諸先生。贊成顧先生的見解的有錢玄同，傅斯年，胡適，丁文江諸先生。爭論時雙方都旗鼓相當，陣勢嚴整，故頗多精采之論。但一般持反對論的人只能在幾部古書裏面滾來滾去，不能利用現代的科學知識去相責難，以致不能克服他們。不僅是這樣，他們這一邊有好些受過現代科學洗禮的人為之助威，遂使他們的勢力愈加膨脹。第一個助威的人是哲學博士胡適先生，他在十三年二月八日的一篇論文中說：「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它，虛心地試驗它，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這幾個月的討論不幸漸漸的走向墳墓的枝葉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讀者被這幾萬字的討論迷着了，或者竟忽略了這個中心的見解，所以我要把它重提出來，重引起大家的注意。」（見同書同冊一九一頁）他于說明顧先生「

這個見解起于崔述」，並舉井田論的演進史為之開端後，即進而批駁到劉掞黎先生的意見，末了，總括道：「以上所說，不過是我個人的讀後感。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見同書同冊一九八頁）第二個助威的人是地質學家丁在君先生，他于是在二月十一日給顧先生的信中說：「禹治水之說絕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跡。」江尤其如此。」又說：「去年同揚子江水道委員會的技師王三三君等同赴萬縣，他對我說，「就是要用現代的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時代的禹如何有這種能力？」我說禹是石器時代的人，因為我們至今沒有發見夏代的銅器。」（見同書同冊二〇八頁）這樣一來，一般所謂新漢學家或整理國故者是一時勝利了。顧先生把這些討論的文學編成古史辨第一冊，于十五年六月出版，因書的傳播，使他們的勝利愈加發揚了。

可是他們于這種勝利之後，竟無以為繼，遂致不能繼續維持他們的權威。自他們推翻禹以前的一切帝王後，一般青年學子本來萬分熱烈地希望他們弄出一個頭緒，建設一部信史來。但胡適之先生于十二年七月雖已立下古史的骨幹（參看同書同冊九七至九九頁），標題剛先生雖已手

同時企圖建設信史（參看同書同冊九七和九九頁），不意繼古史辨第一冊而出現于各種報章雜誌上面的東西，仍舊是一些沒有頭緒的片段文字。迨古史辨第二冊于十九年九月出版，人們已大失所望，繼此佈刊的古史辨第三冊兩厚本，更少人過問，因為語其內容，每况愈下，越弄越枝節

## 改革省制與更新縣政論（七）

克明

### （三）改革省制之原則

（一）改革省制之先決條件：今之談改革省制者，其於現行省制之流弊，非不言之詳盡而深切也；然多偏頗不全，實未能統籌兼顧。側重於更定區域者，類多忽於改訂官制；偏向於改訂官制者，又皆略於更定區域。更定區域而不改訂官制，不過縮小省區而已，固不足以語改革省制；改訂官制而不更定區域，僅乃形式之變換而已，更不足以言改革省制也。夫省制之改革，誠不能不更定區域，以杜流弊而開宏規；然徒更定區域而止，則流弊且難杜防，宏規庸能偉致？官制之改訂，自亦改革省制應有之義，且較更定區域為輕而易舉；然僅以改訂官制為能，不過朝三暮四之變易耳，何能見實質之效耶？蓋史實所詔示，區制與官制，不能相離而須並行也。

了。「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大家已經明白看出胡博士所領導的「寧」派人，只能運用唯心而又淺薄的實驗主義，做做校勘的工作，至于建設信史的責任不是他們所能担负的。同時顧先生也在「一種學問的完成，有待于長期的研究」這種口實之下，把他的終身事業宣佈出來了。

綜觀往史，後世區制之更定，往往仿自前代官制之遺規；前代臨時便宜之設施，常為後世經常制度所取法。前漢州部刺史，開後漢州牧之漸；歷魏晉而仍依違其間，及唐乃立十道之制，即前者之例也。魏晉及唐之行台，元代因襲而改行省；明季總督巡撫之官制，遜清沿用而為定制，即後者之例也。溯歷代因革之跡，則知因仍區制而易官制者，其病在於監司之官增；沿襲官制而更區制者，其病在於行政之權落。監司之官增，雖已足為地方行政之累，然尚無害於地方行政之本身也。行政之權落，則不僅地方行政受其害，國家治權且蒙不利矣。故惟官制與區制同時改革，方能並收其效也。

漢因秦之區制，更官制而增監司之任，置廢無常，更迭不已；卒無澄清吏治之望，反益制度紛擾之累。魏晉沿

漢之官制，更區制而不能監司之官，終至監司之官愈增而

治權愈縮，地方行政之權日落而系統日亂。隋文罷州存郡，

循名責實，其弊盡捐；隋雖二世而亡，然唐初貞觀之治，

實植基於斯矣。是官制與區制同時改革之明效也。中唐

以降，踵事增華，監司之官，反溢於古，益以藩鎮專擅，

遂釀燎原之禍。宋初規復隋唐舊制，罷監司之任，重州縣

之權，縱區全國爲諸路，而不設常置之官。吏治修明，至

今美稱。是又官制與區制同時改革之明效也。及宋之衰，

監司之權日重，且更因事增置，漫無底止。地方行政備受

箇制，動輒干涉；不審惟是，從而懷奪。坐使地方官吏肆

懲監司之術不得不力求其工，轉以親民之任視爲不亟之務

。地方行政旁落無餘，國家治權剝奪殆盡，吏治之壞，蓋

有由來矣。元置行省，區制雖多更定，而監司之官較宋倍

增。明因元舊，區制縱略有變遷，而官制徒易名目。積非

勝是，視若固然；賢者疵議，徒寄感慨。清襲明制，無所

更易；且以明季因事設置之官，悉以變爲地方經常之制。

冗官滿布，以臨州郡，箇制攘奪之科條益密，地方行政之

權旁落益甚。故今日之改制，須先探求隋唐之遺規，參訂

宋之舊制；方能免已往之流弊。然後求證於學理，考驗於

事實；始克開未來之宏規。否則不蹈魏晉之覆轍，即犯明

清之舊病；非特無益，反滋紛擾而已。

是以求古而準今，區制之更定不能離官制而獨立，官制之改訂不能棄區制而孤行。縮小省區之議，改訂官制之論，俱非改革省制之道，非有兼籌並顧之策，不足以爲功也。然世變方新，人事日繁，考之於古，不必盡驗於今，兼顧歷代官制與區制之相同沿革，而並籌其改革，可爲殷鑒，而猶不能盡其能事。必也參酌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之所宜，而使經濟區域與政治區域因地制宜，分別區畫；區域與政治區域之實情，而使普通地方行政與特殊技術行政，因時制宜，別樹系統；官制之改訂，方可切於事理，而利於實行。此爲改革省制之最要原則也，惜時人多忽視耳。

(二)行政區域劃分之原則；今之地理學家，對於分區之意見，雖不能盡同，然約略言之，大別有二：一曰自然區域，二曰地理區域。自然區域者，以其地形氣候土壤地質等之天然因素，而別爲各區；各區以其各在同一地形氣候之下，其人民之生活習慣，莫不相似，故可自成一經濟單位，因亦稱之爲經濟區域。地理區域者，不盡以自然環境爲依歸，兼及於交通都市物產人口等人文環境之特點。

，從而區畫，因亦將稱之爲人文區域。各國政治區域之區分，一則以歷史之因襲，類多不合於自然區域與人文區域之原則；二則以政治權力行使之便利，往往糅合割裂而成龐雜之單位。是以政治區域之不合理不獨我國爲然，各國亦難倖免；惟各國國土狹小，益以交通事業日臻發達，區域之劃分雖不當，而人爲之補救足以稍彌其失，不如我國之顯著，然學者猶常識之。考我國政治區域之劃分，自秦之制定郡區爲始。秦之定郡區也，雖以諸侯之國改置爲郡，而郡區絕非以原有國境爲界，曾斟酌人文自然環境而重爲釐定；如滅魏而置三川，亡楚而析九江長沙會稽等郡是也。雖其轄境之廣狹懸殊，而當時配置之苦心可概見矣。漢興郡國並行，以秦郡之轄境過廣者，更爲抑置，至孝平時有郡國一百有三，後雖建州以察郡國縣吏，而政治區域仍以郡爲重心。魏晉縱有更易，而州地日蹙幾與郡等；郡未以州而廢，州反因郡而夷，是以隋文廢郡存州，煬帝廢州存郡，無所扞格，而反利於行也。唐設十道，宋分二十六路，雖在州郡以上，別置區域，然政治區域未改秦漢之舊，州府猶爲地方行政之樞紐。元明以降，州郡地削而望輕，大州升府，府遂代州而普行。故明清之府，實即隋唐之州；隋唐之州，亦即秦漢之郡；名異而實無不同。清沿明制

，府位縣之上，省之下，介其間而爲承轉；雖官制之用意淒失，而區制之規模猶存也。歷秦漢而迄明之亡，二千年間，縣以上之行政區域，雖名目幾易，轄境屢變，而終不能廢者，蓋二級制度非唐之道縣，宋之路縣，元明清之省縣，而實爲郡縣，州縣，與府縣也。郡縣州縣府縣歷久而不能廢者，自有存在之價值耳。民國初元，力主地方行政二級制度，不廢其當廢之省，而廢其不當廢之府，坐使二級制度之良效未見，反貽割據之病。此固由於軍閥之專橫，爲之主因；然區制之予人以隙，亦無事諱言之事實也，後雖併府設道，然又不廢省改道，而竟恢復適清之三級制度。封疆大吏之權未嘗稍減，道處省縣之間不過督流而已；何足以補積弊之失哉？故今之改省區者，宜酌參沿革，考驗事實，新省區之政治區域，應以州府取中而擇之，此一義也。

我國歷代地方行政，至爲簡易，所謂親民之官，不過司刑名錢穀之事耳。海通以來，建設教育實業水利等事業，漸次發達，所司亦較往昔爲繁。然主政者往往無專門學識，且延攬人才亦不以專門人材是求，致令地方事業發展滯遲。兼以畛域自限，鄰境視若敵國，祇求於己無過，不問他人受害。是以事屬兩省而須通力合作者，輒相推諉；

偶與兩省利害不均者，急相趨避。太湖水利，地界江浙；縱各旱設專局，而終日久無功。運河濱滯，魯蘇共之；每遇興工，動起爭畔。淮泗平原，原爲膏腴之地；今因分隸五省，任其荒廢，地變斥鹵，聚爲盜藪。此更數百年來區域之失，有識者早已論之詳矣。今欲亟圖補救，則政治區域之區分以外，宜更適應自然環境，別定經濟區域。經濟區域領域不妨較現行省爲大，盡可包括若干政治區域而自成爲單位，此又一義也。

甲、政治區域之要點：縣以上之政治區域，或名爲省，或名爲府，均無不可，而其要點則有三：

1. 轄縣不宜過多亦不宜過少：夫轄縣過多則區域大，控制不易；轄縣過少則區域小，稽核過繁。歷代郡州府轄縣，大抵不逾三十縣；今雖交通便利，不必盡準於古；然至多亦不能逾五十縣，宜四十以縣爲率。如今之省區，轄縣多者竟逾百數，地域遼闊，交通阻梗，自各縣以達省會，動逾旬日，或須假道迂迴，始能相通。情意既相隔閡，政令自多窒碍矣。若使此百餘縣之一省，抑置三四區，則其弊自能免也。

2. 畫界宜新定標準不宜沿襲舊規：今之談縮小省區者，不曰以現行省區分割，即曰以原有道區爲準，不知省區

犬牙相錯，與自然環境人文環境諸多背謬；道區制定即以省區爲標準，未嘗別參新意也。如今之江浙兩省，浙西之杭嘉湖，江南之蘇松常，皆爲太湖流域平原；自明初割隸兩省，昔人即譏爲腰斬。顧亭林曰：「自蘇松常與杭嘉湖接境之地，既無山海之阻，又無關隘可塞，割然中斷。譬之人身，恰至腰臂，分爲兩截，其何能生？」皖之寧國太平兩府，與蘇之江寧；秦漢以來向隸一區，清析江南省爲江蘇安徽，始隸兩省，故風俗習慣，至今與皖北殊致；交通物產，依然與江寧爲使。是須參酌古代州郡府制，重新釐訂爲標準爲不可緩也。

3. 標準宜顧自然環境兼及人文環境：今之省區最足爲詬病者，與自然環境過於背謬而與人文環境亦多不合也。如浙東浙西一爲平原一爲山地；地形不同，風俗互異，而強合爲一省。粵之欽廉本與梧州相聯，同風一俗，宜爲一區；而自明以來，不隸廣西。田道一帶與桂林柳州，地勢風俗根本不同，而反同屬一省。豫陝秦嶺以南各縣，就地形應與長江流域相合，而今政治區域強使歸之於黃河流域。故豫南之固始潢洲，與彰德所屬人文環境迥相遠隔，與皖之桐城安慶反相近似。豫北在黃河北岸，與冀之大名磁州本相聯屬；而今割隸豫魯，強爲畫分，兩不相通。是以

標準急須參合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而重新釐訂也。

乙、經濟區域之要點。政治區域之畫分，其主要目標，在乎政治之措施；使其區域合乎自然區域與人文區域之所宜，則行使可便而效力易宏。然政治區不宜過大，過大則耳目不周，情偽難辨；同在一自然區域以內，為使政治行使之便利計，仍有不免分割之虞。故欲補救政治區域之失，須賴於經濟區域之制定也。但經濟區域之制定既為補救政治區域之失，則其畫分之標準，宜於政治區域相呼應，其要點有三：

1. 經濟區域應合若干政治區域而組成：全國自然環境，以河流山脈而分為數區，各區各以歷史地理之種種因緣，人事不無小別，顧大體則多相類。今若以此大體相類之自然環境，區為經濟區域，復將小別之人文環境，參以自然環境，再畫為政治區域。則每一經濟區域可包括若干政治區域；今若干政治單位即成為一經濟單位，可分可合，各以其便；政治之行使既無扞格，經濟之設施亦多便利矣。如淮泗流域，今分隸於豫皖蘇魯，面積甚廣，如就政治運用而畫分，仍不能不分為數區；今以經濟區域補其不足，則已往之弊可免，而經濟與政治之措置，俱能相輔以行而易見其效矣。

## 2. 經濟區域與政治區域應分工而合作：政治之推行

，宜求普遍，故區域不能過廣，經濟之措施，宜求集中，故區域不能太狹。兩者之作用既殊，是須分工而使各任其事。但若不相為謀而獨行其是，則分工不清者，其權限必多衝突；事權不相衝突者，其事業又易參商。是故分工須有合作之目標，合作更須有分工之界限。庶幾權限不致衝突，而事業可收指臂之效也。然則如之何可幾也？曰：政治之推行首以農村為目標；集其力量造成政治城邑，以與農村之血脉相灌通。經濟之設施先以近代都市為起點，舉其財富造成經濟中心，以與政治首邑之脈絡相聯結。從而運用經濟中心之財富，益之以首邑之政治權力，推進農村之改造，以收復興農村發展農業之良效。如斯分工，合作之效乃可見矣。昔以政治勢力而成之首邑，各省均有名城，但非經濟之重鎮；一旦政治變化，即衰落難恢舊觀。如洛陽西安古代之國都也，顧當年之盛況今皆成陳迹矣。上海天津之能成巨埠，非國人之力，且多為帝國主義侵略之要津。苟無完善組織以培實力，則外力侵略，終難抗拒。於國於民，俱有害而無利。是須自造經濟中心都市，以發展全國經濟事業，始能充實自力，而與外力相抗也。

如河套平原果能開發，包頭即可為塞外之經濟中心；淮泗流域果能興墾，蚌埠即可成江淮之經濟都市。又如漢口蕪湖加以有計畫之建設，均能驟居重鎮。此則經濟區域之經濟設施為不可或缺之要圖，而又不能不與政治區域共有同一之合作目標者也。

3. 經濟區域應以地理背景而分別設施：全國各地，宜於牧者不必宜於農，宜於礦者不必宜於工；故須各以域內之所宜，而析為礦業區或工業區，畜牧區或農業區。礦以產藏之不同；產煤者未必有鐵，產金屬者未必有石油。

## 美國之貿金政策

### (一) 美國實行貿金政策之前夕

世界大戰以後，美金元成為世界上的標準貨幣。其後一九二五年四月英國恢復金本位以來，英鎊的信用又逐漸恢復，迄一九三一年九月英國再度廢止金本位制，這標準貨幣的地位，祇得讓美金元獨占了。

但因恐慌之怒潮及于金融，美國一九三三年突如也停止金本制，究竟是長久停止抑或一時停止，實是疑問，究竟當時美國政府自身也沒有確定的方針。

其後美國政府由大總統下令對於金之輸出禁止，稍加

緩和，許可交易上金之必要輸出；至四月末已然決定長期停用金本位制，六月上旬并已經兩院通過成為定法。當美國決定永久脫離金本位時，英首相麥克唐納，法首相赫里歐為世界經濟會議約請美國參加并求其諒解起見，特赴美國；實在有識之士自美國決定脫離金本位時，已然知道美國有獨行其是之勢。果然在經濟會議時，因美國之通貨問題及鷹兌問題而絕裂。至一九三三年八月末美國政府又發布允許新產金出口之法令。以上為一九三三年二月以來美國對「金」政策之綱要。

美國政府為達到其目的，毅然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宣布買金政策。按美國此次不僅祇買國內黃金，並于十月十九日發表吸收海外市場黃金。此舉實對世界經濟界一大打擊。美國未脫離金本位制之前，一盎司金值二十一美元六角七分，脫離金本位制後，美紙幣與金價完全絕緣。

自去年八月美國允許新產金出口時，正值英法金價高過

美國，因此產金業者均霑海外金價貴之利益；雖然向海外輸出，但對於美國國內全市場之供給需求關係上，並無若何影響。當時美國顯然係有意提高金價。

#### (二) 美國實行買金政策之國內情勢

美國政府十月二十五日聲明買金時，金市場所公布之市價，一盎斯值三十一美元三角六分，十月三十一日值三十二美元一角二分，十一月十日竟漲至三十三美元二角，

全然一帆風順上漲。美國決行買金政策，而何故屢次提高

金之市價？接美政府為辯明並非對於「金」壓迫，乃為使

物價提高至恐慌前市價。一九三三年三月金融恐慌後，美政府實行挽救釐條策，成效甚著。截至一九三三年七月，一切物價，股票市價，全呈上漲；但八月以後又顯反動徵兆。如史基爾股票二月僅二十三美元，七月昂至六十六美元，八月後反落至四十美元。三十種工業股票平均市價三

月是五十二美元，七月增至一百〇八元，最近又縮成九十九元；小麥三月是四角八分一英斗(Bushel)七月增至一元，最近又降至八角九分，此外一切農產物及各種生產品全呈此種現象，社會一般對產業復興運動，咸抱疑懷。對於政府所謂買金係為提高物價一節，認為提高金之市價為錯誤的辦法。

我們仔細檢討買金政策與提高物價之關係。如果美政府買金充當貨幣，必然物價騰貴。但美國現停用金本位，金不過商品之一種，貨幣祇是紙幣，如增發紙幣，可使物價騰昂，增加「金」並非增加通貨，自然不能提高物價。並且金之市場提高時，紙幣對金價格降落，而非紙幣對於一般物價低落。因此提高金市價祇有利於產金業者，對於一般物價並無直接關係。

#### (三) 美國實行買金政策之國際影響

美之買金政策，雖對提高物價無直接關係，但不能謂其無影響。金價提高乃美元鈔票對金價值之低落，在鈔兌市價上可以觀察出來。法蘭西等用金國，其貨幣與金價漲落一致，因美國之收買黃金後，美元既對金跌價，當然在對外價值上亦低落。雖英日等廢止金本位國家，亦受同樣影響。當美國決定買金時所發表「買價」，其市價與英法

市場之金塊價值不相上下，但初時不過在美國國境內收買；故當十月二十五日發表買金政策之前後，並無若何變動；且美元匯兌反呈昂騰現象。其後美政府更擴張買金範圍於海外市場，美元始遽行減值。反之，各國匯兌價格昂騰。例如日美匯兌在發表買金時是二十八美元，此前是三十美元，可以明徵外國貨幣價格之高漲與美元之跌落。試將最近紐約匯兌市場對日英法德四國市場低落之情狀表列如左：

	對 日	對 英	對 法	對 德
法定平價	\$49.85	\$4.86	\$0.039	\$23.82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三日匯兌市價	\$27.75	\$4.62	\$0.058	\$34.20
二十四日市價	\$28.75	\$4.77	\$0.058	\$35.85
二十五日市價	\$28.75	\$4.73	\$0.058	\$35.95
二十六日市價	\$28.56	\$4.74	\$0.058	\$35.75
二十八日市價	\$28.37	\$4.72	\$0.058	\$35.60
三十日市價	\$28.75	\$4.75	\$0.058	\$35.85
十一月一日市價	\$29.00	\$4.80	\$0.060	\$36.70
四日市價	\$29.25	\$4.86	\$0.060	\$37.02
十日市價	\$30.43	\$5.10	\$0.062	\$38.30

(註)法定平價即如日美法定平價為日百圓值美元四十九元八角五分

由右表觀察：美國發表買金政策之前即十月二十四日，每百日圓值二十八美元七角五分，至十一月十日漲至三十美元四角三分，即「圓」價之昂騰，亦即「美元」跌價一元六角八分。再如對英匯兌：美、英、法定平價，英國一鎊值美元四元八角六分，當十月二十四日時美英匯兌為一鎊值美元四元七角七分，稍低於法定平價。至十一月十日高至五元十分，鎊價增加三角三分。而美金則落價三角三分。其他對法對德均屬同樣（對德係以一百馬克對美為比例；對法係以一法郎對美元之比例）。

#### (四) 買金政策對於美國自身之影響

美元價之低落，對於美國財界，對於提高物價均有重大影響。因美元匯價之低落，為提高物價之大原因。接美國廢止金本位制之第一目的，在使美元匯價之低落，果自金本位制停止後對英匯價由三月之三元五角至七月降與法定平價相等。（法定平價為四元八角六分）其後又稍提高至四元六角。自買金政策實行以來遂降至五元。至於對日當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匯價為二十美元，一九三三年三月為二十三美元，七月為二十九美元，其後漸次低落至買金

政策實行後，竟落至三十美元。由此可知，萬元匯價，對金本位國跌價相當法定平價百分之四十；對英國也落至平價以下；對日本則緩和騰躋的程度，當然在理論方面如此，物價一定可漸提高，此美國之原目的也。

#### (五) 買金政策對於國際上之影響

美國之買金政策，不但是國內經濟問題，在國際間有極重大關係。若美國澈底實行買金，法國等金本位國，恐將不得已亦停止金本位矣。法國現保有八百億法郎之金，作為紙幣之準備金，法國紙幣之發行額與準備金額相等，故會有法國縱然流出黃金百萬法郎，對於金本位制毫無動搖之豪語。事實上果然如此，法國忍決難維持金本位制。按法國雖號稱金本位制國家，但實際上能否確保兌換之自由，尚屬疑問。表面上縱然兌換自由，而事實上以種種手段限制加減實行自由兌換。如果法國不禁止黃金出口，祇因美元匯價之低落，法郎匯價之日騰，法國在產業貿易上，在國際貸借上，甚可憂慮。祇此一點美買金政策即對金本位制有不利影響。

英國之於美國買金政策，也不免於不利。英國硬幣，比前年停止金本位時，金準備顯著有增加。一九三三年六月為一億九千萬鎊，最近已及二億鎊，可見英國之努力吸

收黃金。再就匯兌政策而言，英國去年有設匯兌平衡資金之趣旨，因一九三三年其資金自一億五千萬激增至三億五千萬，故擬以此抑制匯兌之奔騰。因此美國吸收英國黃金，又降低美元匯價，使英鎊價格飛騰，自然英國反對，今後匯兌鬥爭，方興未艾，就今日狀況看來，英國絕不能袖手旁觀也。

現在世界各國多廢止金本位制，其實併非全部脫離金，祇停止金之兌換，禁止金的輸出耳。但發行紙幣，依然以金為基礎。日本與英國雖是用限制屈伸法的國家，美國等雖是用比例準備制的國家，而發行紙幣一樣需要正貨為準備，則各處不變。（正貨即硬幣、票據等。）法、荷蘭，比利時，意大利，德意志，瑞士等金本位國不消說，即其他不與黃金絕緣諸國，當世界藏金最富的美國，實行大規模的吸收黃金場合中，一定難免有激烈的國際經濟戰，而戰鬥的方式與激烈之程度，均將以美國之態度為轉移。

#### (六) 美買金政策對於日本之影響

美國買金政策對於日本影響如何呢？第一，影響於日美匯兌，凡依日圓價低之經營產業者，匯兌回復三十美元之匯兌率，當然悲觀。但是世界諸國皆以減低匯價為政策，法國之法郎，平均日本一圓值十二法郎，現在低落四法

郎有餘，超過三分之一。荷蘭之基打，日本每百圓值一百二十四基打，現今亦低落四十四基打。英國二先令半相當日金一圓，近低落一先令二便士，低落率佔全數百分之四十。對美匯兌，法定平價是每百日圓對美元四十九元八角五分，一九三二年低至二十美元，頃近又返至三十美元。以前日本對美匯價之昂騰，是受大眾昂騰之影響；現在之昂騰單是日圓對美元之昂騰，從前日美匯兌併無重大影響，此次則情形不同，日本產業界頗受惡影響也。

## 我也談談團結·淨化與領袖

尹梓述

新歲之際，本刊記者，曾提出今年幾個大問題以當獻歲之辭。其第一問題為「國民黨之團結與淨化」。略謂：「……國民黨之本身問題，實為今年一個大問題。推陳出新乃生物學上必然之原則，國民黨欲不失其有機體作用，則當本生長<sup>grow</sup>之義，先求黨的健全，以赴當前政治之危局。按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迄今已十載，自十七年總登記迄今亦已七年。依政黨成例，黨的本身早應有整理陣容，淘汰腐惡，補充生力之必要，……不宜再為粉飾太平，自欺欺人之補缸式的團結，而應澈底整理，汰舊補新，樹立黨魁，以求以黨未有不狂熱而死者也。蓋莠草不拔，則嘉禾不長，蠹蟲不

方針。如一九三三年三月廢止金本位後，併無不逕現象

可以澈底實行停止金本位；然兩月以後，又許可新產金輸出，雖為例外，當然是弛禁黃金。且更過二月，又採用買金政策，其資金是美國金融復興公司發行五千萬美元公司債票充之；變度之速，足以證明美政府之率爾從事，但此舉前途，却關係不小。

治國之實際。今年召集之四中全會與五金代會，其可以負此使命而饗我人之望乎？」（本刊二十八號）

吾人閱讀之餘，不禁發生無限之感觸！良以人必自侮然後人侮，國必自伐然後人伐。年來因黨爭而牽動政爭，因內訌而惹起外侮者已非一次。欲統一全國已涣散之人心，同仇敵愾，自必先以黨內人員一德一心為基礎，此種團結救國之論，在理論上本無可非議。但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欲謀團結，必先淨化；若不經淨化之階段，而期望團結之實現，何啻熟毒內蘊未經清導，遂服參著以滋補之，未有不狂熱而死者也。蓋莠草不拔，則嘉禾不長，蠹蟲不

除，則樹株不榮，腐肉敗血不去，則新肌無從而生。張廣生先生曾謂：

「……歷年之變亂，胥由黨內不肖分子與軍閥官僚勾結而成。此等人固未嘗具有一貫之主張，當其在中央時，則挾政柄以爲威福之具，不惜排斥異己以召亂。及其在野也，又不惜曲解主義，毀棄黨綱，以徇黨外人之見，甚且與叛逆合謀以擠中央。……救濟之法，應自黨員遵守紀律始，應自推尊領袖執行紀律始。……宜先將黨中之敗類，一律掃除；其有不服從中央，好持異議，或甘心附逆者，應即開除黨籍永不復起；或以武力剷除之。」（本刊第九號整飭紀綱與內戰）

良以此種不守紀律之兩棲式份子，其藉黨毀黨，甘爲敵黨之奸息內應，聲援，與苗中之莠，樹中之蠹，附骨之疽，形同一致。較明目彰膽之叛黨脫黨者，尤爲毒辣！若姑息優容，不忍一時之痛，偷安旦夕，苟且敷衍，則閱時愈久，其蔓延，剝蝕瀆濁之範圍，將愈廣愈深而不可收拾。惟有咬定牙關，一瞑不視，鋤之薰之，芟夷而蘊崇之，舉腐肉敗血，刮割而蕩滌之，然後方能萌芽新質，發榮滋長，再生新肌，恢復健康也。故不經淨化而高談團結，其結果徒使黨之生命加重一番危機而已。按諸過去事實，尤

已鑄成如山之鐵案：試觀自九一八變起，一時群鼓之聲，黨內外即高唱入雲，一則函電紛馳，輿論喧騰；一則和平使節，相望於道。乃始則迫最高軍事領袖，歸隱奉化，汪胡又互相推諉，不肯入京，陷中樞於無主者彌月。坐令日軍直驅南下，越長城，據榆關，囊括北滿，繼則汪來胡去，勢成冰炭，西南與中央，依然對峙。於以釀成所謂人民政府之空前巨變。而所謂人民政府之主動人物，即當日醉旋京粵合作最有力之調人，此豈高唱團結者所能夢想及之哉？當閩變發動之初，團結之聲又起，中央迭派大員南下迎胡，間關領表。閩中已改元建號，留滬中委猶有用政治手腕解決之建議，均思假團結之威靈，以期化干戈爲玉帛。作者當時閱胡夢華氏「國民黨大病在補破鉢，一補再補，補而又破，破而又補」（本刊二十六號閩變與國民黨自覺自救）等語，竊笑團結威靈之在今日，無異破廟土偶，業被推落糞窖。污穢遍體。臭氣冲天，塗之人且掩鼻而過，又安望其再現靈驗，香火復盛哉？果也，中委張繼等奔走結果，徒討得西南執行部「以燕伐燕」幾通電報，及胡漢民之空頭支票一八項主張，徒足增長閩逆之兇焰而已。使非最高軍事領袖，對於討逆方略，事先運籌盡善，咸竹在胸，指揮若定，毅然拒絕其「蔣汪下野，蔡蔣回頭」，

」（胡漢民語）之荒謬主張，則夜長夢多，相持既久，彼中立觀望之灰色分子，所謂「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定，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管異之刪通論語）者，必乘機肆其縱橫捭闔之詭謀，大局不知變化糜爛至何地步？縱人民政府未必能移至南京，取國民黨而代之，然此次之四中全會又焉能如期舉行哉？幸如天之福，未中詭謀，甫逾月而大亂蕩平，則此次四中全會之能按期舉行於中央，其團結之力耶，抑稍持淨化之功耶？此不待智者而知也。惟觀此次全會雖如期開幕而胡漢民蕭佛成等仍未北來，西南執行部不但無自動取消之動議，且提出胡漢民八項主張之空頭支票，而所謂「開會既不出席，會後又妄持異議」之分子，仍大有人在，則此次全會之所謂「國民黨大團結」，其爲誠意耶？虛偽耶？亦難逃明眼人之洞察者也。在未經淨化之虛偽團結中，其一切提案，決議，敢決其均無何等價值！縱因閏變之迅速消弭，得演此一幕「破壞重圓」，紅樓續夢」之喜劇，各方一時相安於無事，然其勢亦如賈長沙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遂以爲安者也。有何樂觀之可言哉？

嘗思吾國儒家提倡名教，本意在使人循名責實，實至名歸，非不善也；乃末流所至，往往崇尚虛名不務實際。

如家庭之間，兄弟妯娌爲爭私財意見，朝夕詬訐，甚至怒目相視，操戈相逐，而其家長，猶執「不痴不聾，不作阿姑阿翁」之義，勉強支持其大家庭之門面，鄉黨公論，亦仍唱「九世同居」之高調，以分離異居爲有傷天倫而譴言之。又如婦女青春守寡，復無產業，業已秘密賣淫，而其父母族人，猶艱稱節烈之美名，以再醮爲名教所恥，而強其繼續守節。其結果一則家業敗落，或竟釀成骨肉相殘之巨禍；一則醜聲四揚，貽社會以無限之隱憂，此偏激之士所以有「名教殺人」，「禮教吃人」之怪論也。年來黨內之貌合神離，肝胆楚越久矣：或則樹幟南粵，與中央黨部分庭抗禮，獨立稱尊；或則首鼠兩端，性同兩棲，掛中委之名，而日發毀黨之論，爲反對黨張目，此次閏變諸人，更已明目張膽，脫離黨之關係，倒戈相向，此與兄弟鬪牆，寡婦秘密賣淫之事，明明有過之無不及者。乃猶鷺團結之虛名，諱言淨化。雜薰蕕於一堂，遂以爲團結之成功，非自欺欺人而何耶？如以此論爲奇。請徵諸總理遺教；其言曰：

「……許多黨員，總是想作大官，如果是得志的作了大官，便心滿意足，這些黨員的心理，以爲達到作官的目的，革命事業便算了結一樣。如果是不得志的，不

能作大官，便反對本黨去贊成敵黨。至於熱心黨務，真正為本黨主義奮鬥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數黨員都是以加入本黨為作官的終南捷徑。因為加入本黨的目的，都是在作官，所以黨員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黨的份子，便非常複雜。……照本總理看起來

最要緊的事，是應該乘此機會，把那些不良份子，設法去淘汰，那些份子都淘汰完了，留下來的份子，自然是優秀的。大家便可從此振作精神，一致為主義去奮鬥。作黨員的精神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能夠為主義去犧牲。大家為黨作事，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澈底作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作大事，不可想作大官，如果存心想作大官，便失去黨員的真精神。

」（民國十二年十月對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訓詞）

此言凡存心高官厚爵，不肯為主義奮鬥犧牲者，即失去黨員精神，乃人格卑劣之不良份子，應設法屏諸黨外，取消其黨員資格。必俟不良份子汰淘淨盡，優秀份子方能振作精神，一致為主義奮鬥也。故總理又謂：

「……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什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同志的思想見識過於幼稚，常生出無謂的悞解。所以我們的團結力非常涣散，革命因此失敗。……政黨中最要緊的事，是各位黨員有一種精神結合。要各位黨員能設精神上結合，第一要犧牲自由；第二要貢獻能力。如果個人能設犧牲自由，然後黨方能自由。如果個人能貢獻能力，然後全黨纔有能力。等到全黨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後纔能擔負革命的大事業，纔能改造國家。本

黨以前的失敗，是各位黨員有自由，全黨無自由；各位黨員有能力，全黨無能力。中國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這個原因。我們今日改組，便先要除去這個毛病。（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對國民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演說詞）

又謂：「……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是誤於錯改平等自由……在普通社會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團體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團體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了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團體。所以民國十三年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於平等自由的思想，衝破了政治團體。就政治團體範圍講，或者是國家，或者是政黨；就平等自由的界限說，或者是本國與外國相競爭，或者是本黨與他黨相競爭，都應該有平等自由。不能說在本國之內，或者是在本黨之內，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我們中國人講平等自由，恰恰相反。無論甚麼人在那一種團體之中，不管團體先有沒有平等自由，總是要自己個人有平等自由。……因為大家都是為個人爭自由平等，不為團體去爭自由平等，止有個人行動，沒有團體行動，所以團體便為思想所打破，不久就無形銷滅。……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貢獻到革命黨內來。凡是黨內的紀律，大家都遵守。黨內的命令，大家都服從。全黨運動，一致進行，範全黨有自由，個人不能有自由。然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成功。」（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對黃埔軍官學校告別詞）

以上兩節，皆言黨員的基本資格，在犧牲個人的自由平等，服從黨內的紀律命令，「要把自己的聰明才力貢獻到黨內來。自己的聰明才力不可歸個人所用，要歸黨內所用。」反是則黨必無形消滅而需要急速改組矣。

吾人根據右列三段遺教，以衡量今日黨內之情形與黨員之成分，則覺所謂「各位黨員有自由而全黨無自由，各個黨員有能力而全黨無能力，祇有個人行動，沒有團體行動」之毛病，不但未經除去，而且沉痼愈深。至「存心作大官不肖爲主義奮鬥犧牲」之不良份子，更大有人在，無可諱言。彼改元稱制，倒戈相向，割據稱雄，不服中央者，豈止志在大官？明明係劉邦楚項羽所謂「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固當如是」之皇帝思想。與總理所謂「手抱日月之陳炯明，割據廣西稱龍王之龍濟光」輩，有何分別？無足論已，即彼居中委之位，而逍遙海上，遙領黨員最高俸給，不但未見貢獻絲毫能力歸黨所用，而且當訓政時期，竟高唱「開放政權」與黨外官僚政客相互應，此爲個人行動自由耶？抑係團體行動自由耶？再如號稱左右現局之黨國者夙，正受中央三顧三聘之隆遇若胡漢民氏者，當身任五院院長垂青拖紫時，則始終站在中央立場，維持統一，討桂之役，胡謂：「中央此舉，係維持威信與綱紀。就黨言，乃以革命勢力，對抗反革命勢力，就政府言，乃以中央討伐稱兵作亂之叛將。」一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三全代會閉幕演辭）西北之役，胡曰：「中央統一財政，統一軍政，事屬當然，國人亦當然以爲建設中國必先統一。中國統一，既爲民衆一致之要求，則如有妨礙之者，是爲黨國之公敵。桂系昧於此義，竟以中央爲要挾權利之目的，稍

有不遂，即發怨詞。不知現在之中央，所謂民主集權，亦祇有民主而無集權」。又曰：「中國現狀，宛如大海孤舟。際此風雨飄搖之會，若不能一致同心，共達彼岸，而在舟中批評舵師如何如何，議論籠羅，勢不至覆舟不止。則中國前途，尚復何望？」迄今回憶此項言論，見其爲中央辯解之殷，國家呼籲之切，猶足識人欽感。乃此次閩變發動，胡氏竟大表同情，飾辭袒護。一則曰：「以南京對福建，等於以燕伐燕。」再則曰：「陳李係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舉叛黨亂國之罪，歸咎於中央之逼迫。閩軍侵入浙境，中央飛機向福州威脅，胡氏於去年三十日通電對中央飛機百端攻擊，危詞聳動，以爲兆瓜分之禍。直至昌言解決時局，須「蔣汪下野，蔣蔡回頭。」不但將中央與福建，等立齊觀，且對擁護三民主義之忠實領袖，望其下野自殺；對推翻三民主義之叛徒，反望其回頭團結。與浪蕩子驅逐貞節髮妻，甘與猖狂訂白頭之盟者，如出一轍。在中央討桂諸役，所謂稱兵作亂之叛將，仍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而胡氏知目爲「反革命勢力。」當時北伐完成，全國統一，邊境尙安，而胡氏知「統一爲建設中國之前提，乃民衆一致之要求。」妨礙之者爲「黨國之公敵。」認中國「現狀爲大海孤舟。不應在舟中批評舵師如何如何。」今閩變諸逆，明明建號稱制，通電脫離國民黨，撤廢總理遺像還囑，與各反對黨揉合。甚至內聯共匪，外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大公報於五日載閩軍將軍放棄廈門引日本水兵入城與中央軍直接衝突之逆謀）豈止「稍有不遂，即發怨詞」而已！自九一八以來，東北四省，無形割讓，外患內憂之交相並迫，又豈十八年「風雨孤舟」之喻所能形容其

萬一。中國此時之需要「統一」與「集權」，及「一致同心」，其迫切之程度，更豈不百倍於當日？而胡氏對於閩逆破壞「民衆一致要求之期」，並未聞目爲「黨國之公敵」；而反提出所謂空頭支票之八項主張，對中央責難備至，自己即「在舟中批評舵帥如何如何，議論龐雜」而置「覆舟」之禍於不顧。其狐掘狐狸，爲虎作倀，化仇爲友，自親爲敵，向之警戒他人勿爲者，今忽躬自蹈之，「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宣戰」（梁啟超語）食言自肥，自相矛盾，前後判若兩人者，果何故歟？毋亦昔日身居中樞，大權在握，印繢蠻，綴若若；今則僅有中委空銜，無印無綬故耳。試觀彼對中委張繼見訪時，開口第一句謂：「我今日猶得爲黨員耶？」此一語也，非明確供認昔日「作大官」得爲黨員；今日閑居妙高台，不復得爲黨員乎？否則胡氏不但未經開除黨籍，且任黨中最高位置，中委——何忽自認已非黨員哉？「此種作了大官，便心滿意足，不能作大官，便反對本黨，去贊成敵黨」（總理語）之黨員，其爲「熱心黨務」；忠實同志，應一致團結耶？抑係「人格卑劣之不良分子」，應加以「淘汰」耶？其近日言行之荒謬絕倫，黨外輿論，亦爲齒冷（參觀去年十二月大公報社論胡漢民之今昔，及天津益世報社論胡漢民八項主張之效力）乃中央反目爲黨國柱石，一若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大演其急抱佛脚之技，使節頻遣，必欲其東山再起，以求團結，不亦僂乎？總理常言：「祇想升官發財，這是假革命黨，祇冒革命之名。革命黨名譽被他弄壞了，我們一定要排斥這種假革命黨。」依此遺教，則中央所三聘三顧及四中全會所崇爲泰山北斗，提其空頭支票之八項

主張，作爲討論之中心，視爲政綱之準繩者，便起總理於九原，寧不赫然震怒，毅然淘汰排斥哉？況細察今日黨內「祇想升官發財之假革命份子」，又豈止一二，而四中全會既建築在虛偽團結之一名詞上，自不能討論及此。縱聞有整飭黨紀之提議，而黨魁不立，雖有紀律，誰爲執行？所謂鋼的紀律之口號，在過去早已聲震海內，而何以徒成具文？人人得自由放縱於紀律之外？良由一國三公，政出多門，黨權割裂，支離破碎；既無實際負責總攬一切之中心領袖，徒法又豈能自行乎？故不言團結與整飭紀律而已，如真欲團結，則必先淨化，真欲整飭黨紀，則必恢復黨魁制，推定執行紀律之中心領袖。所謂欲清其流，必濬其源，振衣者必提其領，舉網者必提其綱也。彼補苴式之團結與具文式之黨紀，吾見其效力亦與會場緊張之空氣與開會之時日同其長短久暫而已。夢華氏曰：

「組黨之重要意義，原在團結力量，而團結力量必須先有中心力量如衆星拱辰，爲行星之向太陽，然後始有秩序。……此中心力量爲何？即一黨之黨魁是。蓋有黨魁，則一切統於一，然後才不至分，才有團結；才有多力量，才有號令，才能活動，才有道德的維繫，才能執行紀律，而團結得以永久。」（閩變與國民黨自覺自救）

此誠國民黨本身存亡盛衰之定諭，而爲真正信仰主義之忠實同志所應深刻注意，一致努力，促其實現者也。

文 藝

悲壯的戰死（詩劇）八續

楊若萍

你愛我更應愛我們的國家，  
我愛你亦應愛我們的中國，  
國家若存在纔能存在着你我，  
國家若危亡你我便不能生活，

親愛的相當的教育你也曾受過，  
我們應具為國而忘家的高尚人格，  
親愛的你應贊助我的壯舉！  
我大志已定絕不容有所消磨。

女：

親愛的你既已立定壯志不可消磨，  
我雖然難割愛侶但也無可奈何，  
我雖然愚昧還有愛國家的思想，  
柔情纏綿的確是阻礙愛國的惡魔。

如今我愛你更愛我們的國家，  
愛你我不阻礙你偉大的志願，  
愛國我更贊助你偉大的圖謀，  
願你志向堅定切莫有所流連。

為國犧牲真是莫大的光榮，  
戰勝歸來更是莫大的快樂，  
夜殘了月沉了我們安息吧！  
此後我願比美於月裏嫦娥。

男：

這樣纔是新時代的女郎，“  
這樣纔是弱國家的曙光，  
我感謝你贊助我的心腸，  
我欽佩你愛國家的思想。

男女携手：

暴日兇殘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國人應應聲而起挫折此兇鋒，  
為國犧牲是國民應盡的天職，  
喋血沙場是國民無上的光榮，  
離愁難挨我決忍受着沉默。

（時夜殘日闌，男女携手走入室門，幕閉）